

万卷方法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概念界定：

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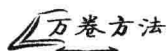
加里·戈茨 (Gary Goertz) 著

尹继武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概念界定：
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

加里·戈茨 (Gary Goertz) 著
尹继武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Copyright © 2006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Market Place, Woodstock,
Oxfordshire OX20 1S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原书英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版权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08)第0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
(美)戈茨(Goertz, G.)著;尹继武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4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ISBN 978-7-5624-8002-0

I. ①概… II. ①戈… ②尹… III. ①社会科学—学
学研究 IV. ①C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3188号



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

加里·戈茨 著

尹继武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桂木 邹荣

责任编辑:邹荣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2.25 字数:274千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8002-0 定价:3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鸣 谢

首先,我必须感谢本书各章的合著者。比尔·狄克逊(Bill Dixon)、乔·休伊特(Joe Hewitt)以及吉姆·马奥尼(Jim Mahoney)对于本书更趋完善贡献良多,与此同时,与他们共事亦是一种快乐。就更为广泛意义而言,安迪·贝内特(Andy Bennett)、戴维·科里尔(David Collier)、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和约翰·格里(John Gerring)给予了一贯的支持,并且对于本书的早先几稿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定性方法小组的设立,以及定性方法研究所(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每年一度的培训活动,在概念及其方法论问题上造就了一个可以接纳新人和参与其事的知识共同体。本书的若干章节曾在定性方法研究所作过介绍,而参与者的反馈极富价值。多年来,我与贝尔·布拉姆勒(Bear Braumoeller)有过诸多极富兴味的交谈,这对于我对本书所涉及的许多话题的思考贡献匪浅。

特别要感谢的是查尔斯·拉吉(Charles Ragin)。当本书完稿近半时,查尔斯加盟了亚利桑那大学。他的意见、他的著述以及他的洞识都是极为宝贵的。本书所采取的总体路径,可以补充他多年来一直推动和坚持的学术理路。在许多方面,本书可以看作是他那本《模糊集合社会科学》(*Fuzzy-Set Social Science*)的姊妹篇。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大学数学教授和导师阿诺德·韦德尔(Arnold Wedel),正是他教我学会了如何才能将数学与社会科学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

目 录

1 导 论	1
-------------	---

第 I 部分 概念的理论、结构和经验分析

2 结构化和理论化概念	18
3 概念内涵与外延	44
4 增加概念度量的一致性	60
5 可替代性、聚合以及最弱连接度量——与威廉·F. 迪克逊合著	81

第 II 部分 概念和个案选择

6 概念和因变量(有关的)选择——与约瑟夫·休伊特合著	99
7 否定性个案的选择:可能性原则——与詹姆斯·马奥尼合著	111
8 概念和总体选择——与约瑟夫·休伊特合著	134

第 III 部分 理论中的概念

9 理论中的概念:双层次理论——与詹姆斯·马奥尼合著	151
参考文献	171
练习与网站	181
术语及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182
译后记	187

导 论 1

定义一个事物，就是从这一事物所有的属性中，选取那些被理解为由其名称所指代且宣示的特定属性；而在我们足以能够确定选取哪些属性作为定义之用最为合适之际，这些属性必须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每个命题包括两个名称（概念）：并且每个命题都肯定或否定其中之一，或者另一概念……在此，我们因而发现了名称之含义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名称与所指涉的事物间之关系，为何必须成为我们所从事的探究的预备阶段之事的新理由。

J. S. 密尔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an Stuart Mill)在他的《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开篇之初，就宣称这是一本专门探讨概念的“书”。从概念开始，这是一种逻辑选择，因为对于建构理论命题来说，概念就是主要的建筑之物。命题逻辑包括对符号(symbols)的恰当处理。为此，为了具备科学的有效性，这些符号就必须被赋予实体内容。在本书中，我将阐述我们如何建构实体概念，并且讨论对于不同概念结构的经验研究(定性与定量的)的意义。

尽管概念有着原生意义上的重要性，但多年以来，社会科学家对于它们的关注却微不足道。^①在概念研究方面，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与戴维·科里尔(David Collier)是顶尖级人物；然而，较之于浩如烟海般的定量测量、指标、量表以及诸如此类的文献，我们所看到的差距之大简直无以复加。因此，这就是我们的矛盾之处：正如密尔所指出的，概念是我们各种理论的核心部分；然而，除萨托利和科里尔之外，大部分研究者对于社会科学概念本身的关注却微乎其微。(尽管可见到Ragin, 2000)

这种悖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定性研究者与定量研究者之间的深刻分歧。作为社会科学(至少是在政治科学与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种社会学事实，定性研究者主要关注概念，这通常被认为是非数学的领域且涉及实体性的问题，而定量研究者则集中于研究测量、指标、信度以及与产生最优量化测量有关的其他问题。

在本书中，我将试图跨越横亘在关注实体性有效概念的定性学者与热衷于精确量化测量的定量研究者之间的这一鸿沟(或者按照你的意愿而称之为裂痕)。正如本书标题所示，这将是一种非平衡的处理：本书将集中于概念问题的讨论。然而，我

① 我们或许会探究概念的界定。与给出一种定义相反(概述请参阅 Adcock, 1998)，我更愿意通过含蓄地讨论如何建构它们来加以定义。这与几何学词根(primitives)大致相像，比如点和线通过它们的定理来定义。

将揭示概念对于定量测量的设计与建构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和数学含义。正如数十年前,拉扎斯菲尔德和巴顿所言:

在我们能够着手研究存在或缺失某个属性之前……或者说,在我们能够根据某个变量归类对象或测量它们之前,我们必须形成有关那个变量的概念。(Lazarsfeld and Barton, 1951, 155, 斜体为引者所加)

尽管我们对理论应该引导方法论的断论赞赏有加,但常见的情形却是喧宾夺主、本末倒置。这一症状,在加格斯和格尔(Jagers and Gurr, 1995)关于民主的政体概念讨论中显露无遗^①。他们两人关于民主概念的分析,实际上是在“操作化民主”一节当中:很明显,讨论的焦点在于定量测量,而不是概念本身。与此相反,我将以大量篇幅讨论有关民主的各种概念化工作;只是在此之后,我才能随之分析有关定量测量的结果问题。

在定性研究者与定量研究者之间的分歧一仍其旧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分析者而言,要同时兼顾二者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戈茨的第二定律(Second Law)^②宣称:

对于概念的关注程度,与对定量测量的关注成反比。

科里尔和博伦(Bollen)关于民主论说的差异,彰显了这一定律的存在。科里尔和马洪(Collier and Mahon, 1993)对于民主的概念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分析,但对于如何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定量研究却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在民主的定量测度上,博伦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对民主概念的讨论却只有寥寥数语。

就此而论,本书意在破除戈茨的第二定律。我将详尽分析建构概念的主要途径,但又并不会止步于此。我将继续推进我的分析,亦即检视不同的概念结构如何对于定量度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含意。例如,本书讨论民主问题的第4章会说明,信服于某种概念,也就意味着由此所进行的测量会大大不同于从民主指标、量表等定量研究文献中所发现的测量。

金、基欧汉和维巴(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著作的出版,重新点燃了关于定性方法的独特性以及缺失定性方法所造成之局面的讨论。2003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定性方法小组的设立,就是对于金等人挑战的一种回应。这一小组已经创设了三个奖项,其中之一便是乔瓦尼·萨托利图书奖。回溯萨托利于1970年发表的那篇名作,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是在批判定量方法。与此不同的是,我将认真对待概念,但同时我也将提出一些大多数定性方法学者如何建构概念的形式模型和数学模型。因此,我的分析将一分为二:一者是说明,萨托利的某些主张必须加以认真的验证;二者则要揭示,许多定量测量并未完全适合它所预设反映的那些概念。

*

大部分就概念问题展开论述的文献采取了我所指称的语义路径(semantic approach)(Sartori, 1970, 1984; Gerring, 1997)。萨托利对这种思考概念的方式进行

^① 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是在《和平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Gleditsch, Metelits, and Strand 2003)。

^② 戈茨的第一定律是,所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都能发现必要条件假设(Goertz, 2003)。

了分类,例如,其论文(Sartori,1984)的上半部分,就是对诸如“国家”(state)或“政权”(état)的词语进行语义分析。从一种更为哲学化的视角来看,概念与定义紧密相关;事实上,在定义某个词语与对某一概念进行分析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Robinson,1950)。如果询问这样的问题:“你所说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邀请谈话者提供一种定义。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回复“你的民主概念是什么?”的回答,二者并无实质区别。

与此相反,本书认为,概念包含着对于词语所指对象或现象的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一个好的概念会描绘出在其所指称对象之行为中非常重要的特性。定义的核心属性,是指那些与假设、解释以及因果机制具有相关性的内容。在科学概念的理论经验观点看来,如果我们对于现象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么它们的语义也会变化。试以“铜”(Copper)的概念为例:当铜的定义或概念发生改变之际,也就反映了化学家就此所形成的新知识。

作为一种更具文字和哲学化路径的反映,萨托利(Sartori,1984)从经典的翻译问题开始。法文中的“état”应翻译成英语中的“state”(国家)或“government”(政府)吗?^①另一个经典的事例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概念“virtù”^{*}。应当注意的是,我所给出的普通例子在下述意义上并没有问题:英语中的“copper”(铜)概念,与法语中的“cuivre”并无区别;这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化学家关于铜的原子理论是一致的。再如,关于“社团主义”(corporatism)定义的争论,并非关涉其定义本身,而是集中于社团主义现象(真实生活)。

上述问题的潜在背景是“唯名论”(nominalism)与“实在论”(realism)的争议问题。在语义符号层次,则并无争议可言;我们用来指涉现象的词语、符号或象征,都是随意选择的。例如,巴比(Babbie,2001)在他那本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畅销教科书中,探讨了关于概念问题的极端唯名论观点。在关于意义以及何者决定意义的问题上,他将自身置于红皇后的阵营(Red Queen's camp)。就更为一般的意义而言,所有那些纯粹关注语义问题的学者,最后都极易接受定义出自随意的观点。如果一个概念不是与某一现象的经验分析紧密相关,那么也就不存在我们可以将概念加以锚定(anchor)的对象,而所有事情也就成为负责定义者任意所为之事。例如,前苏东国家经常冠名为人民“民主”共和国;这种用法,实际上是政治权力与语义权力的滥用。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关于民主的定义以适用于这些国家,那么,我们关于民主的假设同样也必须加以改变。与此相类似,我们也不能将社团主义的概念与社团主义如何适合于理论分离开来——不论作为一种自变量还是因变量。

与概念的唯名论者观点相对的另一路径,我们可以坦然地称之为——概念和定义的实在论者(realist)视角。这一分野至少可以追溯到洛克,但或许都可以归之为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哲学家区分了物体的“本质的”(essential)属性与“表面的”(superficial)属性。本质属性的改变,构成了性质(kind)的变化,而表面特性的变化——用洛克的术语来说就是“名字的”变化——并不会导致性质的改变。譬如,

① 我们必须指出,gouvernement 也是一个法语单词。

* 汉语文献有时直接译为“佛尔托”;这是最早由马基雅维利开始使用的词汇,含意复杂,意涉德性、品质、才能、力量、器度和雄风等——译者注。

在一种民主政制中,从总统制到议会制的变化,并不会产生从民主政制到威权政制的变化。然而,如果除去了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等本质属性,那么,政治体制则会改变其基本特点。让我们再回到化学领域,某一元素的温度变化,会导致电子数发生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元素表中归类的变化。

概念是关于本体论的理论:概念就是关于某一现象之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虽然许多定量研究者会发现“本体论的”术语极具煽动性,而许多阐释论者可能也会反对我的用法,但我仍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用“本体论的”这个术语去界定某一现象的核心特征以及诸特征间的关系。例如,我们会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福利国家;一般来说,这是那些负责提供失业保险、医疗服务、养老福利以及诸如此类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家。而要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就必须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

总而言之,我在此提出了一种因果论的、本体论的以及实在论的概念观。其本体论特征在于,这种观念集中探讨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现象;其因果论特征在于,这种观念确认本体属性会在因果假设、解释和机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其实在论特征在于,这一观念包括了对现象的经验分析。我所主张的这一路径强调,概念分析包括探知现象的构成(constitutive)特性,而这些特性具有至为关键的因果作用;这些因果作用和因果机制在我们的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概念、词语及其定义的纯粹语义分析,是永远不够的。

*

本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是,概念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量表、指标以及诸如此类的文献所显示的,建构一种定量度量有多种方法。但除了科里尔及其同事的少数几篇重要论文外,关于如何建构概念的不同方法,学界却少有讨论甚或没有讨论。

我在此强调指出,就其性质而论,我们所运用的多数重要概念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和多层次的(*multilevel*)。例如,萨托利(Sartori, 1970)的文章讨论了高级、中级以及低级层次的分类,而科里尔和马洪(Collier and Mahon, 1993)则运用首要类型与次要类型的术语。而我则更倾向于运用“三层次”概念的框架。

理论上,最为重要的层次通常是在理论命题中所使用的那些概念,诸如“社团主义”“民主”或“福利国家”。这就是我所指称的基本层次(*basic level*)。在埃莉诺·罗斯(Eleanor Rosch)及其同事看来,这种概念是“基本的”;同时,在认知上居于核心地位。这类概念是我们可以在其之前添加形容词的名词,诸如议会民主或者民主社团主义。基本层次就是我们在理论命题中所使用的概念。

仅次于基本层次的,就是我所指称的第二层次(*secondary level*)。譬如,当我们说民主是由公民权利、竞争性选举等构成时,我们也就进到了第二层次,也就是对基本层次的民主概念给出了构成维度。当我们前行至第二层次之时,概念的多维度特征才开始显现。第二层次维度形成了许多概念的本体论分析。在各种形式的因果机制中,它们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接下来的层次,就是我所指称的指标/数据层次(*indicator/data level*);易言之,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操作化层次。在这一层次上,无论被归于概念名下的是某种特殊的现象、个人或事件,我们都获得了足够多的细节,从而数据可以得到收集,由

此我们也可以进行归类,或者是依据二分法,或者是更为精细的量表。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三种方式剖析概念:(1)它们有多少个层次;(2)每一层次又有多少维度;(3)在每个层次上,每种维度的实体内容是什么。

表 1.1 显示了对民主进行概念化的学术努力中具有三个层次特征的重要成果。除了科皮奇(Coppedge)和赖尼克(Reinicke)的略有不同以外,其他学者均将民主看作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由于民主是一个复杂概念,所以分析其组成部分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我们说民主的第二层次的维度时,会包括诸如“竞争”(如竞选职位)和“参与”(如投票)等。第二层次的维度仍保留了理论大厦的痕迹,但已经足够具体,能够在指标/数据层次上进行操作化。第三个层次即指标/数据层次,也就是我们进入现实经验数据之处。例如,一般来说,第二层次的因素如参与和竞争等,会有多种指标;这些指标就是那些实际上用以编码并形成量化测量之基础的变量。

表 1.1 若干民主概念及其度量

创立者	第二层次	指标/数据层次	集合方法
阿尔瓦雷斯等 (Alvarez et al., 1996)	争论(contestation)	多党制 行政轮流坐庄	乘法
	公职(offices)	选举行政机关 选举立法机关	
阿拉特(Arat, 1991)	参与	行政选举	第二层次为乘法 指标层次为加法
		立法选举	
		立法有效性	
	竞争	提名竞选 政党合法性 政党竞争	
博伦和格兰让(Boollen and Grandjean, 1981)	政治自由	新闻自由	第二层次是加法 指标层次是因素分析
		团体反对派的自由	
		政府批准(sanctions)	
	人民主权	选举公正 行政选举 立法选举	
科皮奇和赖尼克(Coppedge & Reinicke, 1991)	争论	自由和公正选举	格特曼量表(Guttman scale)
		表达自由	
		结社自由	
		媒体多元主义	
加斯蒂尔(Gastil, 1978—)	政治权利	9 种成分	加法
	公民权利	13 种成分	

续表

创立者	第二层次	指标/数据层次	集合方法
哈德纽斯(Hadenius,1992)	选举	选举权	第二层次为加法 指标层次为加法或乘法
		选举公职	
		有意义的选举	
		结社自由	
		表达自由	
加格斯和格尔(Jaggers and Gurr,1995)	政治自由	免受强制的自由	加法
		行政首脑制衡	
		参与的竞争性	
		参与的规则	
		行政招录竞争	
万哈宁(Vanhanen,1990)	行政制衡	行政招录公开	乘法
	竞争参与	选举结果	
		人人都有选举权	

我所探究的概念结构的第二方面,就是某一层次的成分如何结合或构造成上一层次的维度。基本层次的民主概念是由多方面的第二层次维度构成的,但这些维度又如何“结合”起来而形成基本层次的概念?

在本书中,我始终坚持对比研究建构多维度和多层次概念的两种结构原则。第一种原则的鼻祖为亚里士多德,是运用必要与充分条件的结构去建构概念。在传统的哲学逻辑中,定义某一概念,就是给出必要与充分条件,察看某个事物是否符合这种分类。每一必要条件都是第二层次的维度,而将第二层次的各种维度聚集在一起以形成基本层次的结构凝聚力(glue),就是必要与充分条件的数学逻辑。

充要条件的概念观一度十分普遍,以至于萨托利(Sartori,1970)只采用了这一种观念。然而,哲学、逻辑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的进展,向我们展现了其他建构概念的方法。我在本书将集中探讨“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概念结构——在许多方面,这是与充要条件结构完全相对的一极。在其原创性的论文中,科里尔和马洪(Collier and Mahon,1993)将家族相似性概念的理念引入到了政治科学文献当中。家族相似性结构可以看作是充要条件结构的对立物,因为这一家庭相似结构并没有包含必要条件。任何事物,只需要有足够的第二层次维度的相似性,就可以成为家族的一分子。譬如,在本书第6章中,我将讨论国际冲突研究中所使用的两种概念。国际危机行为研究组(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group)(Brecher, Wilkenfeld and Mose,1988)的“危机”概念,所遵循的就是传统的充要条件的概念路径;而“军事化国际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的理念(Jones, Bremer, and Singer, 1995)所遵循的则是一种家族相似性的路径。

讨论概念问题的定性研究文献完全可以通过集合论(set theory)或逻辑学的方法实现数理形式化。例如,用充要条件方法或家族相似性手段建构概念,也就意味着隐含地使用了逻辑数学。我在本书中将证明,这些形式工具也就是对我所指出的两种核心概念结构进行建模的天然方式。我们将说明,逻辑上的“与”(AND)代表

了必要与充分条件结构,而逻辑上的“或”(OR)则是家族相似性结构建模的天然方式。在本书中,将作为二分法的传统逻辑观拓展成连续变量领域,模糊逻辑(Fuzzy logic)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就许多方面而论,本书第2章构成了全书的核心。我将在这一章详尽说明基础性的三层次概念观,围绕着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概念如何能够建构以及如何实际建构的主要问题而集中讨论充要条件的概念结构和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结构。我会提出,多数复杂和抽象的概念事实上都具有上述三个层次的结构。基本层次与第二层次实际上就是有关概念的理论,而指标/数据层次则是连接度量与数据收集的桥梁。

萨托利和科里尔关于概念问题的著述,其核心是对“概念延伸”(conceptual stretching)的关注。当概念相对放宽因而可以应用于额外的个案时,概念延伸就会出现。在哲学文献中,这里有外延(*extension*)与内涵(*intension*)的区隔。古典的原理是,当我们放宽概念(例如,缩减内涵),那么我们就扩大了它的外延(增加了经验个案的数量)。因此,概念结构的一个要点,就是它的覆盖面或包容性(*permissiveness*)。本书第3章将论述萨托利和科里尔所关注的问题,即概念的结构如何与其经验覆盖面相关。

萨托利(Sartori, 1970)借用了哲学逻辑学中的基本原理,即当内涵缩减时,外延就会扩大;也就是说,当概念所要求的特征愈少,其包容性也就愈大,而概念就会适用更多的案例。在这里,萨托利未加讨论而假定的是,概念是由必要和充分条件建构而成的。然而,正如本书第3章所指出的,如果我们采用家族相似性的框架,那么事实上,增加内涵(即增加更多的特性),也能扩大外延。问题的关键是,概念结构对于概念的经验覆盖面具有重要的“顺流结果”(downstream consequences)。

理想类型概念最为与众不同,它们的外延为零;在规范意义上讲,“理想”则意味着,在实践中其经验案例几乎没有或者根本不存在。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对内涵和外延之关系的关注。理想类型概念将注意力集中于概念连续谱(*continuum*)的极端终点。那么,我们怎样定义这种极端终点的一端呢?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无法实现经验观察的终点,那么又有何用处呢?尽管理想类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几乎不可能找到有关其方法论的讨论。本书第2章所提出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工具,能够使我对于本书第3章中的理想类型概念进行系统的分析。

本书第2章提供对充要条件概念结构和家族相似性概念结构实现形式化的数学工具。一旦掌握了上述方法论工具,也就可以提出定量测量的问题[在我看来,二分法编码(*dichotomous codings*)也属于定量研究]。论述民主问题的第4章则说明了澄清概念结构对于构建定量度量的结果。我在这一章将说明,几乎所有人,也就是说,为数众多的普通人,都可以依据必要与充分条件对民主进行概念化工作;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定量度量会采用与概念本身相适合的数学逻辑。相反,并不合适的数学方法,包括加法、平均数以及相关度等,却几乎得到普遍的采用(见表1.1)。我以有关民主政体的通用数据(Jagers and Gurr, 1995)为例进行研究并说明,如果要建构一种能够反映政体研究学者自己的民主概念的量化度量,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格尔及其同事所发展的定量度量标准。我之所以使用民主概念的案例,就是要强调理论,也就是说概念应当指导方法论;我们必须首先想清楚我们所用概念的实体和结构,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地实现理论的操作。

作化,使之成为一种定量度量标准。

既然大多数复杂概念都有三个层次,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追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定量度量能够体现概念结构。事实上,这里有两个结构性问题:(1)如何将指标结合起来以形成第二层次的维度;(2)如何将第二层次的维度结合起来以获得基本层次的概念。在本篇导论的语境中,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运用充要条件结构将第二层次的维度结合成最终的民主概念;而所有的定量度量要么是采用加法,要么是采用相关度。然而,这些都不是充要条件结构的合适的数学形式化。

本书第2章提出,充要条件的概念路径与家族相似性的概念路径代表了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一如所有复杂概念本身,我们必须在此追问,在上述两个极点之间,是否只存在着某种单维(unidimensional)连续谱。

正如本书第5章所说明的,我们可以依据“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来思考不同的概念结构(Most and Starr, 1989)。必要条件可以定义为那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条件;与此相反,家族相似性路径的特点是,某一特性的缺失,可以由其他特性所取代。由此,连接充要条件结构与家族相似性结构之两极间的连续谱,就是可替代性可能出现的不同程度。

第5章检视了不少学者宣称最为合适的一种概念结构。民主和平论或自由和平论的著述一向集中论说如下假设,亦即民主国家之间互不打仗。这些著述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冲突著作,都必须处理概念结构的问题,因为国际冲突包括两方,甚至多方。那么,问题就此产生了:例如,作为二联体(dyad),民主的概念又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对于冲突各方都分别有民主的评分,但对于如何合计两方的民主得分而建构出作为整体的二联体的度量标准,仍不是非常清楚。由此可见,当我们在组织第二层次的维度以形成基本层次之概念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1993年狄克逊首次提出“最弱连接”(weakest-link)的理念之后,学者们迅速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度量二联体民主(dyadic democracy)的合适方式。这一学说主张,两国间发动战争的制约因素,取决于双方中民主程度较低者,这就是“最弱连接”。在这里,最弱连接的度量所运用的是充要条件概念结构。链条中的每一环都是必要的:一方之长不能替代另一方之短。由此,最弱连接的主张,可以转化为有关可替代性和概念结构的论点。如果最弱连接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民主的二联体度量方式的可替代性越强,它与国际军事冲突的相关度也就越低。本书第5章对于度量二联体民主采用了可替代性程度变化的方式,用以考察在进行可替代性检验时,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概念结构所采用的统计方法,如最大数或平均数,最弱连接(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否会更好。

对于概念如何具有内嵌性的(embedded)因果理论,本书第5章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扩展(extended)案例。最弱连接的度量,就是民主国家间互动理论的具体表达。在采用这种度量方式以基本层次的变量去检验民主和平论的时候,实际上也就采用了这种内嵌性的假说。标准的基本层次假设,是军事冲突因变量(例如,军事争端或危机)与二联体民主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弱连接被用于建构(make up)基本层次的二联体民主的自变量,随后这一自变量又与冲突因变量形成相关度。

就更为一般性的意义而言,对冲突文献的考察表明,典型的冲突变量的总数中有三分之一具有内嵌性的假说。上述考察还表明,至于其他一些变量,学者们往往

暗自偏爱那种能够容纳完全替代性的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结构。例如,当对两国间的多重联盟承诺进行编码时,学者会选取最强的一方。依据替代性的观点,最强的承诺完全可以替代较弱的一方。总而言之,在冲突的量化研究文献中,内嵌在概念中的因果假说是相当普遍的。

本书第 I 部分将探讨概念建构的理论、结构、形式以及经验方面;第 2 章将讨论三层次框架以及原型状态的家族相似性概念结构和充要条件概念结构;第 3 章则涉及概念结构如何与经验范围(如外延)相关;第 4 章将解释概念结构和量化测量理论的顺流结果;第 5 章将阐明重要的理论命题如何嵌入概念之中,以及如何能够接受经验检验。这些章节将结合许多具体案例,解释概念建构的因果性质、本体论性质以及经验性质。

*

在我对概念的分析当中,我始终强调因果理论的核心地位。就其本身而言,这并无新奇之处;但我所讨论的理论化类型,此前却难寻其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理解我的分析与量化标准有何不同,有必要适当讨论度量理论发展的理论背景与实体背景。对于政治科学学者和社会学家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概念测量的早期历史发端于心理学和教育考试。

在心理学领域,问题是要获取某些数字化手段以精确理解一些非常抽象且不可度量的概念,诸如“智力”或“权威性人格”等。根据我的三层次框架,“不可度量”是指概念的基本层次与第二层次,而“可度量”是指第三层次即指标/数据层次。一般来说,心理学著作中的指标,是指对纸笔测验中各项内容的回答。因素分析技术(factor analytic techniques),则是为理解那些不可度量的概念如智力而产生的方法,其关键在于根据相关外显表现如对问题的回答而展开推论以理解相关概念。

拉扎斯菲尔德和布莱洛克(Blalock)是将概念的因素分析路径引入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主要学者。例如,布莱洛克在 1982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化和度量》(*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精辟地阐述了概念与度量的因素分析路径(同样可参阅 Bollen, 1989)。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1966)则全面回溯了他和其他学者从心理学汲取方法论的营养并将其应用于分析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历史过程。

在许多基本的方法上,我的概念分析路径与众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集中分析概念本身,同时也是因为我所感兴趣的是一些诸如社团主义、民主、危机以及军事争端等实体性概念。我的论说重点不是说因素分析路径是错误的,而是说这一路径忽略了某些问题;我还要指出,还存在着其他的概念分析路径,而我们应该且可以依据所研究的实体现象而变换我们的分析路径。

首先,因素分析路径认为,在基本层次或第二层次与指标层次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会生成指标。这基本上属于认识现象的“疾病—征兆”模式:疾病引起了征兆,反之则不然。在因素分析路径中,关注点在于,指标可能由不同的原因所生成,而其中一些原因或许并不是研究者所集中探讨的对象。所以,不能认为因素分析路径仅仅涉及相关度;这一路径暗示,在潜在的、不可度量的变量与指标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因果模型:“所采取的立场……就是,通过建构起

明确设立假说的因果模型,指标变量通常可以与基础性的或不可度量的变量连接起来。在一些简单的因果情境中,其间通常预设指标间的相关度是由某个单一的基础性变量所生成,诸如因素分析一类的操作程序便可以用来对不可度量的变量进行经验性评估(Blalock,1968,p.6.)。”^①

其次,与因素分析路径形成对照的是,我将讨论本体论而非因果论的概念观。就此而论,基本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维度不是现象生成的原因(causes),而是构成(constitute)现象本身。例如,竞争性选举并不是民主的特征,也不是由民主所生成,相反,它就构成了民主本身。就智力是某人在IQ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原因而论,我并不认为因素分析路径是有问题的。但很显然,症状是由疾病引起的,而疾病本身与症状表现往往大相径庭。我认为,对于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许多概念来说,本体论的视角或许更有裨益。

第三,当我们基本上具备一种功能主义的现象观时,本体论的视角具有更多的意义。许多人以为,除非基本的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否则民主难以正常运转。第二层次的维度,其实就是一种关于在概念的整体中各个部分之相互关系的理论。因此,当理论语言就其性质而论或明或暗地属于功能主义时,人们或许会愿意对概念采取一种本体论的路径。

第四,学者们通常会认为,在指标层次上存在着等效(functional equivalence),例如,符合第二层次维度的会有多种不同现象。在因素分析学派看来,同一个不可度量的、潜在变量的不同指标之间高度相关,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等效理论并不要求有高度的相关性;事实上,反例的存在往往是个好兆头。根据定义,等效是指,A属性的出现能够替代B属性;因此,在指标之间只有很少甚或没有相关性时,第二层次的维度仍能展现出来。

第五,布莱洛克以及其他心理学家关注那些外显形式不易测量的抽象概念和现象。对于“性”或“性别”的度量,并不是因素分析学派所关心的那类概念。就这些概念而论,度量与概念之间即可度量与不可度量之间,相互间的联系极其清晰和直接,因而被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我所集中分析的概念,正如核心案例所示,是那些复杂且多维度的、但在第二层次维度和数据层次的指标之间通常具有非常直接联系的概念。不同于智力概念与对测试问题的回答之间那种巨大的鸿沟,民主的第二层次概念如竞争性选举与其事实数据层次之间的差异则小得多。

上述五个差异构成了一种关于概念的完全不同的视角。集中探讨概念,就是思考已经被概念化的现象的本质。因素分析路径正确强调了现象的结果是重要的。然而,结果的原因,如果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对于疾病本身的考察,起码应该不少于对其症状的考察。

① 训练有素的方法论学者,对于概念及其度量的因果方向问题,经常有明确的意识:“几乎所有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度量都采用结果指标(effect indicators)。因素分析、信度检验以及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都是采用结果指标的技术范例。然而,也存在如下情境,即指标更为实际地被看作是潜在变量的原因,而不是相反。关于原因对结果指标的检验,近期已可兹利用(Bollen and Ting,2000),但是,大多数经验研究都谨慎采用结果指标。对原因与结果指标的错误区分会导致误设模型(misspecified model),并且可能产生矛盾的参数估计,以及误导性的结论(Bollen and Lennox,1991)。”(Bollen,2002,616-17;同时可参阅Blalock,1964,162-69,正是布莱洛克采用了“原因”指标的名称)。

*

成为一个人，或者人类，与具有一个人的本质（essence），是同样的事情。

约翰·洛克

我想运用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基于阿玛蒂亚·森（Sen, 1985）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人类幸福”（human well-being）概念作为现实中三层次概念的案例。努斯鲍姆提出了一种复杂的、多层次且多维度的人类幸福观。这一案例为本书所讨论的诸多话题提供了一个概要，并且还可以说明，复杂的三层次概念在现实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即使她在一种非同寻常的知识背景（即政治哲学）中从事研究工作，这个案例仍再次肯定：我们必须建立既与现象之实质相适应、且与理论相适应的概念。

我们将会看到，内嵌于努斯鲍姆的概念之中的是有关人类在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层面上如何发挥作用的因果假设。这不是定义之争，而是有关人类在世界不同文化中生活之现实的辩论。这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因为事关人性。总而言之，依据其内容和结构，努斯鲍姆的人类幸福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三层次概念即作为因果论的概念、本体论的概念和实在论的概念的介绍。

努斯鲍姆非常清晰地从本体论层面考察人类幸福的概念：“那么，就定义人类生活的内容而言，这是一种对内在本质论的概要，是一种对人类最重要功能的说明。”（Nussbaum, 1992, 214）。她正在对人之含义给出“定义”或进行概念化；她想知道，在经验层面上人类及其生活是如何得到构建的。她所需要的不是何为人的一系列指标或表现，而是对人类幸福本质的描述。

她描述了良好的人类生活所意味着的诸多方面，涉及了许多功能和能力。以下是她的分析中重要的几点：

基本的人类功能之能力：

1. 能够尽可能活得更久以走到完整人生的尽头；既不是未成年就夭折，也不是生活贫乏到活着也没有意义；

2. 能够过着身体健康的生活；不愁衣着；居有所归；有机会得到性满足；能在各地迁徙；

.....

7. 能为他人而生活，和他人一起生活，接受和关心其他人，参与各种形式的家庭和社会交往。

.....

10. 能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别人的；能在非常自我的环境和关系中，过自己的生活。（Nussbaum, 1992, 222）

上述功能就是她的第二层次维度。

努斯鲍姆文章的副标题是“捍卫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这意味着她采用了标准的概念路径，即充要条件结构路径。而连接充要条件结构与本质主义的是一种极其紧密的联系。如果说某些特性对于动物成为人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些特性就

是成为人类的必要条件。她非常清楚,她所探讨的各种维度都是必要的:

就[第二层次]的能力来说,将它们称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是为作出最基本类型的评估。可以说,如果没有了上述各项内容的生活,要成为一个人,则根本是远远不够的。(Nussbaum,1992,222)

在这个第二层次上,她否定了维度之间的可替代性:

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认为,如果缺少了上述任何一种[能力],无论再拥有什么,都将是缺乏人性的……毫无疑问,上述列表包括了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成分。我们不能以提供更大数量的某一项需求来替代性地满足其中另一种需求。(Nussbaum,1992,222)

努斯鲍姆对于人的概念化,所运用的就是基本的三层次框架,而这在复杂及多维度的概念中是屡见不鲜的。诸如上述列表所给出的必要因素,位于人类幸福概念的第二层次。而在第三层次,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对于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依据本书第5章,我们具备了可替代性的若干方法。例如,一个人幼有所养、老有所居、壮有食色,等等。

虽然在高度概括的层面上采用了有关良好(the good)的确定性概念[必要条件],但政治规划[第二层次]仍给公民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以根据本地传统或个人喜好,更加具体且更加多样地详述各种生活要项。(Nussbaum,1992,224)

在第三层次上,我们在满足第二层次的要求时则会考虑文化的变异。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结构,其中,第二层次是充要条件,而在指标/数据层次则是可替代性。我认为,这种特定的结构是极其常见的;而在本书第4章中,我自己也将运用这一结构来重新建构有关民主的政体度量方法。

关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功能主义学说。在其论文的标题“人类机能与社会正义”中,努斯鲍姆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一些本质特征涉及人类的生理层面,诸如衣食住行,等等;另一些则涉及人类的心理层面,诸如作出选择的可能性,等等;另外一些会涉及人类的社会特性,如与他人相处以及为他人而生活。

因此,有关人类幸福或生活质量的森—努斯鲍姆(Sen-Nussbaum)路径,代表了学者们建构复杂多维度且多层次概念的方法;同样,这一路径也表明了本体论概念观与因素分析视角之间的区别。努斯鲍姆所追问的并不是人类幸福的指标或结果是什么,其探求所向直指“人类幸福是什么”。这也是因果性的观点,因为她指出了那些未能具备第二层次功能的人们会在生理层面、心理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上发生何种情形。因而这也是一种关于人类幸福之概念的实在论路径,奠基于她对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文献的阅读之上。

*

本书第Ⅱ部分集中论述了概念的一种核心用途,即选择个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概念化,对于经验分析和因果推论的意义至深且巨。几乎毫无例外,任何学术研究所分析的总体(population)都是由概念加以定义的。第Ⅱ部分的所有章节都彰显